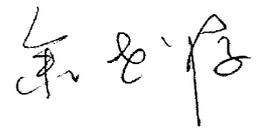


# 知識自覺與現代轉型



質疑漢語知識的合法性並不是自今日開始，但今天的討論可能會更為複雜，也更難以形成共識。比如，新左派的當下意義有多大，它在中國的發展過程裏起到甚麼樣的作用？自由主義將要化中國，還是中國仍會化自由主義？再比如，中共的知識體系，官學系統是如何與世界知識發生聯繫的，又是如何通過新聞體制、出版體制、教育體制、學術體制對中國學人或知識份子施加影響的？漢語知識的當代傳承者在多大程度上對官學有着自覺的拒斥，學術規範性的倡導是否是一條構建漢語知識的正當道路？最後，漢語知識的當代狀況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後發民族國家的知識狀況，而與世界知識「接軌」？這些問題事關漢語知識如何確立其自身在中國的合法性，本文不可能回答全部，只是就如何評價它們在當下中國的意義而作出一點嘗試，以就教於方家和同志。

新左派在中國的發展過程裏起到甚麼樣的作用？自由主義將要化中國，還是中國仍會化自由主義？漢語知識的當代傳承者在多大程度上對官學有着自覺的拒斥？學術規範性的倡導是否是一條構建漢語知識的正當道路？漢語知識的當代狀況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後發民族國家的知識狀況？這些問題事關漢語知識如何確立其自身在中國的合法性。

談論中國知識人的問題，需要對漢語知識的現代變遷做一簡單概括。1840年西方人叩關而入，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沉重打擊了中國知識人的自信和自尊。大量西方知識被傳播、引進，以救亡圖存。對文明的比較、知識的反思，中國知識人最初是停留在粗淺的層面上。一切都需要面對西方列強的存在這一嚴酷事實，使得漢語知識存在的功用從育萬民、淳風俗，參天地之機、開萬世太平一變而為啟蒙救亡、保國保種，其任務在於把數萬萬中國人結成一體，讓個體成員能夠為國家盡責任義務。打破天朝大國美夢的是西方的堅船利炮、是資本，因此，中國人要求漢語知識能夠富國強兵，這一要求隨即成為任何知識體系在中國生存傳承的第一原則。雖然新文化運動等知識運動聲稱「人的解放」，但其落腳點卻也在國家的獨立和強大。所以，漢語知識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自始就充當着意識形態的功用。

在1949年中共建國確立了民族國家的基本框架之後，漢語知識裏有關人的豐富內容很快為中共的意識形態消解，漢語知識為歡呼、禮讚中國擺脫半殖民半封建社會，接受了更為直接的意識形態說教。「新中國把我從鬼變成成人」，這種自豪或感恩使得社會成員對現代知識的運用退回到傳統社會，知識成了教化、宣傳的工具：國民是孩子般的子民，他們沒有知識的自覺，因而也不是知識的主體。對於知識，他們只能懵懵懂懂地表示信或不信，知識的世界於他們而言是異己的，既不是他們的表達，也不是對他們生活的闡釋；國家更類似自然狀態裏眾人偶然的聚集，沒有確定的目標和穩定的規則。

改革開放一度使中國備受世界知識的關注。中國人首先被假設為知道好歹的乖孩子，他們相信終有一天中國人會像發達國家那樣，像美國人那樣生活，等等，這一假定成為漢語知識的某種「律令」，不過，新「律令」與舊「原則」並無本質不同。漢語知識的意識形態特性並未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強。由於此時的西方世界多表現為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多元文化，中國知識人也就要要求漢語知識能夠解答中國的民主化難題，漢語知識再度發揮起啟蒙、批判的作用，從而與中共國家政權構成了相當緊張的關係。

但這種緊張關係隨着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化而得到了部分緩解，更重要的是，冷戰的結束，使得西方國家的力量再度如其殖民擴張時期一樣咄咄逼人，「知識的自負」使得自由主義的理念從政策層面退出，在此情況下，對現代性的反思成了世界知識體系裏的一個引人矚目、但多少帶有經院味道的課題，這個

改革開放一度使中國備受世界知識的關注。由於此時的西方世界多表現為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多元文化，中國知識人也就要要求漢語知識能夠解答中國的民主化難題，漢語知識再度發揮起啟蒙、批判的作用，從而與中共國家政權構成了相當緊張的關係。這種緊張關係隨着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化而得到了部分緩解。



不無重大的課題為部分後發國家的知識份子所心折，並造就了他們想望地方知識翻身解放的光榮夢想。於此同時，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和挫敗也為知識人反思現代性提供了契機，現代性的悖論成了漢語知識界最具審美情懷的命題。這種因素，使得漢語知識表現出空前的繁榮。

顯然，漢語知識因一直以世界知識為鵠的而失去了與中國現實的血肉聯繫，真實地表達國民生存的知識少有出現，知識在中國仍然是由少數人書寫享用，由某種中心源頭發布，層層傳遞後以宣傳品的性質達至國民。這一基本模式使寫實主義、為底層寫作、私人寫作、鄉土寫作等等命題，都能成為知識人的高貴口號並以此邀功傲世；而三農問題、收容遣送問題、民工問題等等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禁區也能被突破，成為知識人新的名利場。而所謂微小敘事卻沉溺於日常生活的細節，與個體生命的普遍權利和自我覺悟無關。從而，漢語知識的繁榮至今沒能創生出任何一種有說服力的關於中國人的現代生存的總體性解釋。只是借助於當代西方世界知識的觀念體系，例如現代化、自由民主，等等，我們才能意識到漢語知識的可能任務。正是從這個角度看，我認為，中國的知識生產仍停留在前現代階段。

我認為，中國的知識生產仍停留在前現代階段。官學仍主宰了漢語知識的基本空間，而非官學領域的自由主義、新左派、民族主義等思潮學派很少進入社會生活的公共領域。他們對中國問題的闡釋，也是為了印證其理論的正確性；他們的對抗和內部分裂，不過是為了加強對自己理論純潔性的追求，這使他們更脫離中國人的生活。

## 二

發達國家知識世界的繁榮表現在方方面面：在生產生活資料、學術思想、娛樂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都有着日新月異的人物事件，中國卻像其他後發國家一樣只有圈內的熱鬧。

官學仍主宰了漢語知識的基本空間，而這一話語體系，因其專注於粉飾現實，它對政治和社會的描述是扭曲和不真實的，其存在的功用或許只在於為分析和窺測中國政治變化的人提供一點隱隱約約的信息。在非官學領域，中國出現了自由主義、新左派、民族主義、國學等思潮學派，但這些知識很少進入中國社會生活的公共領域，更不用說這些知識是否表達了中國國民對現代轉型的前提要求。從總的方面來看，這些思潮學派仍然是新時代的意識形態，他們的出發點在於追求符合某種教義或者原則的國家形態和社會生活，他們以自己的理論為根據要求中國做出相應的變革，他們對中國問題的闡釋，對中國處境的描述，也是為了呼應或者印證其理論的正確性，這些思潮學派之間的對抗和內部分裂，使得他們必須不斷地爭奪信眾、清理門戶，這種局面更加強了他們對自己理論純潔性的追求，也使他們更脫離中國人的生活。

苛刻地說，他們如同寓言中摸象的盲人，因自己手持的工具不同，而只能看到大象的不同部位，一旦失去了手中的工具或者看到了大象的其他部分，他們將手足無措。更為坦白地說：這種知識對於中國社會是如此奢侈、精英化和

體制化，因為它不是城市貧民的知識，不是農民的知識，不是大學生的知識，不是商人的知識，不是社區的知識，不是打工者的知識，不是公務員的知識。它們在中國的存在沒有根基，沒有民眾的認可追隨，因此這些民間知識就很容易被政府駕馭、利用。如《讀書》曾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大本營，但中共對體制資源進行一次調整，它就變成了新左派的陣地；網絡曾是民族主義者的天堂，但中共政策的變化或者網絡管理條例的出台，民族主義者就只能信守沉默是金的古訓，伺機等待狂歡的機會；學院被稱作知識的淨土，但官學的資源集聚工作卻能夠強制整頓學院的知識隊伍。

考察漢語知識的百年變遷，最有意思的問題是漢語知識為甚麼未能完成現代轉型，卻總是表現出越來越浮躁的病症。我認為：歸根結柢，這些問題在於漢語知識的現代轉型的意識形態特性，這種知識的意識形態又特別地表現在對世界知識的參照上。漢語知識的變化始終盯着世界知識，盯着先發國家，從而在其轉向中國社會乃至國家政治制度時，總是表現出令人哭笑不得的曲折機心。當西方以列強面目出現時，中國知識人就要求富國強兵；當西方的自由主義對社會主義取得勝利時，中國知識人就要求民主轉型；當美國新保守主義抬頭時，中國知識人就在民族主義之外苦思冥想第三條道路。在現代轉型的關鍵時刻，西方知識人的眼光始終盯着國家、政權、體制外的國民，關注他們的生存權利，關注他們的發展空間。而中國的知識人總是眼光游移不定，且多半盯着國家政權，等待國家變革的恩典。

### 三

與先發國家革命時代的知識人一樣，所有後發國家成熟的知識人都有着獨立的心態，他們盯着本國的政權，而言說的對象卻是廣大國民。印度的甘地 (Mohandas Gandhi) 是從印度教裏理解非暴力的革命意義，南非的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是從古老的非洲哲學裏吸取寬忍的靈感，捷克的哈威爾 (Vaclav Havel) 是從西方文明主流裏提供說真話的力量，他們沒有任何權宜、謀略，徑直地與本國不公正的政治制度短兵相接。在中國的現代史上，這種知識人的成熟狀態只有五四前後等少數時期存在過，但也很快分裂。

歷史經驗表明：現代轉型的關鍵在於爭取個人自由，爭取個體生命在國家、社會意義上的普遍權利，但中國知識份子卻從各自的處境和信仰中理解這種革命的意義。自由主義到了中國也就分裂成哲學層面的自由主義、政治層面的自由主義。當胡適等自由主義的中國傳人不無曖昧地談論與政府的合作時，個人主義的魯迅明確地表示自己仍是中國生活裏的奴隸，清末是奴隸，到了民國還是奴隸，到了左聯還是奴隸，這種對中國人生活狀態的清醒認識並不為後來的知識人所知，當他們在今天為自由主義立言而千方百計地要把魯迅逐出中

漢語知識的變化始終盯着世界知識，盯着先發國家；當西方以列強面目出現時，中國知識人就要求富國強兵；當西方的自由主義對社會主義取得勝利時，中國知識人就要求民主轉型；當美國新保守主義抬頭時，中國知識人就在民族主義之外苦思冥想第三條道路。中國的知識人總是眼光游移不定，且多半盯着國家政權，等待國家變革的恩典。

國讀書人的聖殿時，中國的自由主義已經裂變為經濟層面的自由主義、神學層面的自由主義、社會層面的自由主義。

實際上，這種知識分裂的情形在中國一再出現，而漢語知識在當代現代轉型中的成果令人驚異地可憐，它從可參照的世界知識那裏盜火播下龍種，卻只是收獲了跳蚤。例如，僅僅過了十幾年，那些激動過一代的經典、天才作家、大師、詩人、學者、思想巨子就從漢語知識領域裏消失了，因此，不必奇怪，曾經影響過一代人的薩特(Jean Paul Sartre)、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等西方知識大師已經從當代漢語知識的演進裏消失，新的一代人用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羅爾斯(John Rawls)、斯特勞斯(Leo Strauss)等來挑戰上一代人的知識不足，而新一代人的個別人，在他重新發現了薩特、海德格爾，以之應對中國問題時，又像當初一代人一樣感到新鮮。

在中國的軸心時代，就有過一次知識反思的大分裂。不過，在那一次，孔老莊墨韓等諸子並沒有世界知識可以參照，他們面對「周文疲弊」，而提供了不同的解答，儒道的經典作家是從人生的角度上想辦法，法家學派則從政治經濟的制度安排上想辦法，因此，他們雖然分裂，卻從不同的層面為中國人提供了生存的哲學，當秦漢帝國建立之時，這些知識的創造者就在社會及其個體那裏獲得了長久的呼應。中國的傳統知識在倫理領域、善的領域、死亡的思辨、生命的信仰、美的界說等方面都有着相當親切宜人的解釋，但在今天，中國既失去了知識對人的理性支持，又喪失了知識對人的安慰作用。

當代漢語知識多元而搖擺不定、豐富而支離破碎。如莊子所說，「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自然，這些話語也是難以包容的，「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人類文明的歷史其實已經把這種天地之美、神明之容的理想化為現實，那就是自由，人類個體生命的至上權利，生生之為大德。但由於怯懦，由於自私，由於盲目，很少有人站出來，為這種天地之美作證。

在我看來，真正的當代漢語只有一個：中國必須唾棄一切專制制度。在中國生活，我們得運用、爭取並保衛我們的權利，我們不做前現代國家裏任人擺布的孩子，我們不能做書本裏的蟲子，我們做孩子、裝孫子太久了，我們有成人的權利。我們有走動權(遷居自由)、我們有思想權(生命自由)、我們有說話權(言論出版自由)、我們有交友權(集會結社自由)。只有如此，才能在現代文明世界裏成就我們中國人的天地大德。

現代轉型的關鍵在於爭取個人自由，爭取個體生命在國家、社會意義上的普遍權利，但中國知識份子卻從各自的處境和信仰中理解自由的意義。自由主義到了中國也就分裂成哲學層面的自由主義、政治層面的自由主義，以至今天已經裂變為經濟層面的自由主義、神學層面的自由主義。